亲历者披露台湾开放两岸探亲内情

今年是两岸开放探亲 30 周年。回首两岸过往,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台湾当局对大陆采取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到现在两岸全面交流,台湾开放探亲是促使两岸关系发展不断向前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台湾在做出这个重大决策前却有一番折冲与迂回。

“即使被抓起来我也不怕”

从台北市议员做起的赵少康,了解基层民众的心声,加上外省子弟的背景,让他一直关注早年来台的老一辈想念大陆家乡的问题。

1986 年 12 月,赵少康当选“立委”,1987 年 3 月 6 日台“立法院”开议,在未事先与台当局高层打招呼的情况下,赵少康“立委”生涯中的第一次质询,就提出开放大陆探亲的话题。

赵少康回忆说,“当时台湾还未宣布解严,两岸还是敌对状态,开放人民赴大陆探亲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对行政院长俞国华质询:基于人道立场,时代的悲剧不应再由无辜的人民独自承担,政府应该协助台海两岸的离散家庭团聚,政府应该给予两岸家庭通信的自由,对于因思乡情切辗转回大陆探亲的民众,不应在其回国后给予不准再出境或停发养老金以及其他的处罚。”

赵少康透露,“质询完后,国民党秘书长马树礼告诉我,这个问题俞院长没法答复。我跟马树礼说,请您向经国先生转达,这个议题我会一直质询到底,即使被抓起来、关起来,我也不怕。”

“十天后,马秘书长又来找我,他说,我的意思他都一五一十跟蒋经国报告了,当时经国先生人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他听了报告以后,沉思了很久才说:好吧,民间的事情由他们去。这意思是,人民可以去大陆,但官员还不行。那时是 1987 年 3 月下旬的事”。

1987 年 7 月 14 日,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9 月 16 日,国民党中常会成立由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吴伯雄、何宜武 5 名中常委组成的项目小组,研议开放国民党老兵赴大陆“返乡探亲”的有关问题。

10 月 14 日,五人项目小组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出研究结论报告并获通过,原则同意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可以赴大陆探亲。

推动成立对大陆专责机构

赵少康说,获悉台当局宣布开放探亲后,他很兴奋,也相信“这个门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11 月 2 日凌晨,还没上班,台北红十字会总部前就已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等这天索取表格登记填写。红十字会事先准备的表格甚至多次发完,只能一再赶印,可见人心思乡之情切。

赵少康表示,当时大陆已有专责对台机构,但台湾还没有,也没有法律依据。他找了多名政治、法律学者草拟“两岸关系条例”,逼使台当局成立专责机构,但遭到一些官员反对。不久“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栋召开党政协调会,大家在一张很大的圆桌上协商,“林栋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李登辉在上面写道:绝不可以设置大陆事务专责机构”。

后来民间呼吁成立专责机构的声浪愈来愈高,才有 1990 年 12 月海基会(具有官方性质的非官方组织)与 1991 年 1 月陆委会的成立。

“戒急用忍”让台湾错失良机

赵少康回想这些年,认为政治人物要有历史感,不能只看眼前。“如果 1988 年 1 月蒋经国去世前还没开放大陆探亲,估计在当时两岸氛围和压力下,继任的李登辉是不敢开放的”。赵少康认为,李登辉当年的“戒急用忍”,让台湾失去了历史机遇,台湾的发展在李登辉执政中期(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走了下坡路。

赵少康说,当年台当局搞“戒急用忍”,以致去大陆的都是中小型台商,这些中小型台商带过去的资金、管理人才,对大陆都有很大贡献,现在这些台商也都发展壮大。如果当时不搞“戒急用忍”,让大台商、大企业进军大陆,投资大陆,两岸不仅能共存共荣,台湾现在更不得了,但历史机遇错过了就错过了。

(摘自《新闻晨报》 陈太曦/文)

张栻一天查办十四个贪官

提起南宋张栻,人们想到的便会是“朱张会讲”、“孔庙先儒”、“湖湘学派”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名词术语。的确,张栻与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成为儒学史上一大盛事。但张栻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思想家,还是一位勤政务实的政治家。

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绍兴三年(1133 年)冬,张栻诞生于父亲张浚在战争前线的阆州(今四川苍溪)官衙。30 岁的张栻以父荫被朝廷授官,出任父亲的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佐父治军。后出任静江(今桂林)知府。

淳熙五年(1178 年),宋孝宗见张栻治理静江有方,特施恩升迁他进直宝文阁,又升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改知江陵府(今湖北荆州)、荆湖北路安抚使。湖北是有名的难治之地,贪官多、盗贼多,贪官鱼肉百姓,盗贼横行乡里。张栻到任伊始,就从治贪入手抓政风,以政风的转变促治安的转变。他首先就弹劾了江陵府一名无所作为、放纵盗贼的官吏,使其罢官去职。他甚至创造过一天内革职查办贪官污吏 14 人的纪录。他又严惩那些窝藏盗贼的平民,使盗贼无处安身,纷纷逃亡。于是,江陵治安不断好转,政风焕然一新。

(摘自《新传奇》)

微博历史

WEI BO LI SHI

邵飘萍

◎《京报》老板邵飘萍(1886—1926 年)生活奢侈。他是中国新闻记者乘私人汽车外出采访的第一人,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多总长还只备马车。他抽的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的,烟盒上印着“振青制用”的字样,振青是邵飘萍的名。

◎1908 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先后死去。清廷规定全国都要停止娱乐,以示国哀。四川成都官府甚至规定每家大门口都要贴挽联,否则就要以罪论处。四川怪才刘师亮对此非常愤慨,做了一副幽默的挽联进行嘲讽。上联:洒几滴普通泪;下联:死两个特别人;横批:通统痛同。特别是横批,念起来声如放铳。

◎茨威格并未失去对人类的信心,在生前最后的散文作品中,他写道:“每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他相信人类的文明必将在新的大陆得到延续,于是他描写了新的辽阔的阿根廷,充满希望的美丽的巴西,“人们应该超出欧洲去思考问题,不要把自己埋葬在渐渐死去的过去,而是要共享历史的再生”。

◎唐信宗时候的宰相郑畋和卢携,经常因为政见不同互相掐架。最严重的一次,两个人当着唐信宗的面,互相指着鼻子骂起来。骂到动情处,居然开始向对方丢砚台。唐信宗坐在那里,看了一场真人大乱斗。结果,双方都被唐信宗贬职,赶了出去。

◎阿斯特夫人是著名的阿斯特家族的最后一任掌门人。她毕生过着奢华的生活,但从不吝啬。她曾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捐赠 2 亿美元,成为纽约最为著名的慈善大王。阿斯特夫人最为著名的箴言是:“金钱如粪土,应当四处播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好的态度并提高他人的生活。”(本报综合)

谁最早将邓小平称为『总设计师』

1978 年 3 月 27 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一篇题为《中国面向南方》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评论此前一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访菲律宾的外交活动。文章说,李先念访问菲律宾是“旨在加强中国同东南亚的联系”的“外交攻势的组成部分”,而发起“第一个主要攻势”的,是“这项政策的设计师邓小平副主席”。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是国外媒体最早以“设计师”来称谓邓小平。

1979 年 1 月,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进一步引发海外媒体对邓小平更多的关注和评论,进而从不同角度使用“设计师”来称谓邓小平。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9 年 1 月 22 日在一篇题为《中国的邓想从美国得到什么》的评论文章中这样描述:邓小平是制订一项利用西方熟练技能、技术和资本来改变中国的大规模计划的主要设计师,用我们熟悉的话语表述,就是邓小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设计师。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展开,以“设计师”来称谓邓小平,逐渐成为海外媒体的普遍做法。不过,海外、国外媒体从不同角度在评价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和影响时,使用的都还是“设计师”“设计大师”“主要设计师”,还未发现有使用“总设计师”的提法的。而对邓小平使用“总设计师”的正式称谓,则是来自我们党内。

1985 年 7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访美时对外称邓小平“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是“总设计师”称谓第一次公开出现于我国领导人的讲话中。随后,“总设计师”的提法逐渐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中央的文件中使用起来。

(摘自《文史博览》 王香平/文)

1977 年震惊全国的高考舞弊案

1977 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连考卷、牛皮纸袋都难解决,对于考卷内容保密和考场纪律,就没有太多精力去苛求,只能做到一些基本的维持——比如在山东,每个考场都要求做到“三光”,即“墙壁光、地面光、桌洞光”,禁止带书包、书籍入考场。河北省印考卷的地方选在了保定的监狱,因为犯人没法出去泄题,全都用铅字排版手工印刷,招生办的人也在监狱里一住就是几十天,印完后装袋,再用上密封贴、密封条,盖上密封章、科目章……每天干完这些工作胳膊肘都抬不起来。

即使如此,这年高考还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故城舞弊案”——河北省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有 6 个女儿,前三个分别在 1973 年、1974 年和 1976 年被“推荐”上了河北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和河北工学院。他的第四个女儿本是故城县郑口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1977 年高考前她未参加学校的选优考试,本不符合报考大学条件。但马连宝先后通知了文教局长、招生办主任和考点负责人,说他家的小四今年要考学。于是上至县委书记,下到考点负责人,几个干部一起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安排。

为了让小四考出好成绩,考点负责人帮她三次换考号,巧排座次,安排水平高的考生同桌,为她保驾助考,还特别从 50 里外的另一个公社,拉来一个数理化较好的人和她同桌,在考试之前就到预定地点与她约好“互相帮助”。考点负责人还告诉她:“有不会的题就出来找我”。等到考试当天,第一科考了 20 分钟后,马连宝还派通讯员为女儿送药,考点负责人趁机将她叫出考场,问明不会的题目,随后将答案送进考场——以后几科也都依法炮制。

同样在故城县,主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常委、县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张砚生,在听到改革招生制度的消息后,就研究新方法有何漏洞可钻,并向县招办探听试题试卷在县里停留多长时间,妄图偷题。随后,还安排了场外答题班子,将答案送进考场。

由于县委书记带头,全县考场随即一片混乱——考点办公室、教室宿舍、甚至马棚,都成了场外做题的据点,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场地,有的考场甚至连围墙都被掏出了洞,有的考生还因为送进了错误的答案而号啕大哭,考生随意进出考场,完全乱了套。有考生当场拒绝这样的考试,气愤地质问:“你们执行的是哪个阶段的考试制度?”群众也议论纷纷,“这不是考学生,是考老师,考爸爸。这样的考试同‘四人帮’横行时一样,没区别!”

这桩舞弊案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挫伤了青少年的学习积极性,有的学生说,我们考得再好,也考不过老师,因此旷课、打架的又多起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刚刹住的歪风又重新刮起来。次年 1 月 16 日,河北省委及衡水地委为此事两次召开常委会,教育部也派人参加了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最终对马连宝等人作出了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

(摘自《新民周刊》 阚政/文)

划算!
真的很划算!

美国进口
辅酶 Q10

99 元/瓶

美国瑞福瑞牌
辅酶 Q10 胶囊
零售价 298 元/瓶(60 粒)
诚信品牌 货到付款

美国原装进口瑞福瑞辅酶 Q10,正规进口产品,获得国家药监局批文字号(国食健字 J20080017)。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的信赖,现举办特价 99 元体验活动,面对新老客户推出特惠体验装(10 瓶),全国共计 10000 瓶,每个家庭最多限领 2 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 7 天,活动结束恢复原价,莫失良机!

夕阳GO乐购

咨询热线(免长途费)
400-807-9993
400-602-0212

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
沪食健广审(文)第 201010006 上海显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 告

中国量子通信网络将西方甩在后面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国正在发展一项叫做量子编码的技术,对目前使用的任何传统解码方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报道称,中国推进量子通信技术,意味着这个国家正在大踏步发展那些可能令互联网更安全的应用程式。其他国家可能在不久后就会发现,他们要向中国购买这些应用。

“无法入侵”的通信

报道称,假如你发送一条想要不被窃听的信息,传统的编码方式是将阅读信息所需的破解码隐藏在非常复杂的数学程式当中。

报道称,电脑运算能力的稳步发展,意味着以数字为基础的密码必须定期地加长。于是加密就是有保存期的,并且正在迅速变得越来越脆弱。

人们担心,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有效地将数码破坏能力向前推进一大步,将令许多现代的加密软件变得不堪一击。而量子通信的工作原理不一样:报道称,如果你想要发送你的保密信息,你首先要另外发送一个埋藏在光粒子当中的密码;只有完成这一步,你才会发送你的加密信息,然后接收者将可以通过事先发送的密码阅读信息。这种所谓量子编码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如果有人试图拦截光粒子,他们就必然会改变或者破坏它。

这意味着,任何进行网络入侵的意图将会被发送者和原定的接收者立即发现——于是才有了它“无法入侵”的说法。

西方被甩在后面

报道称,既然量子通信能够帮助保护网络通信的安全,为什么西方会让中国领先这么多?

伦敦帝国学院的金明混教授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根本不认为这是有需要的。目前解码系统当中的数学程式难度之高,令人们不觉得有必要实施这项新技术。”

报道称,美国和欧洲有一些以密码为基础的量子网络在运作,但是大多数都是被作为研究项目,而不是与商业伙伴合作。

还有一个问题是,类似济南通信网这样的应用程式建立是昂贵的。如果尚未有商业市场,就很难得到投资者或者政府的支持。

报道称,新加坡国立大学量子技术中心的物理学家瓦莱里奥·斯卡拉尼说:“我们必须承认,当中国要投资一个事物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财力和人力可能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上任何实体。”

制造上帝无法区分的光子

位于上海的中科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的一间实验室内,三平米的实验台上看似毫无章法、密密麻麻地布满大大小小的镜片和古怪的器件,一些电线从上方的支架上垂落下来,旁边的一台仪器发出单调的“啾啾”声。

这是近 20 位科研工作者经过 4 年多孕育出的中国量子计算机“婴儿”,它也是世界上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5 月初才在世人面前首次亮相。

量子计算所依据的原理是微观世界最诡异的量子纠缠现象。

“世界上找不到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但我们可以制造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光子,可以开玩笑地说连上帝都无法区分,量子力学中叫做‘全同’。两个独立的光子只有一模一样了,才能让它们产生量子干涉,进而纠缠,否则两个光子谁都不理谁。”光量子计算机的研制者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说。

上帝也无法区分的光子产生于一个单光子源。发出鸣叫声的是制冷机,为单光子源提供零下 269 摄氏度的低温环境。

“我们这里的单光子目前在国际上综合性能最优,全同性比率达到 99.5%,效率比国际上第二名高 10 倍以上。这是由于我们在 2013 年创新了一种激发方法,可以大幅度降低噪音。之前国外技术产生的单光子就好像一对玩了泥巴的双胞胎,你可以通过他们身上的泥巴区分他们,而我们制造出的光子就像把双胞胎洗得干干净净,你就分辨不出他们了。”陆朝阳说。

这个“婴儿”诞生以来,只做了一件事:玩了一个叫“玻色取样”的游戏。这是科学家专门设计出来让量子计算机和经典计算机比赛的游戏。

对着显示屏上高低起伏的谱线,研究员说:“我们仅操纵了 5 个纠缠的光子,它就打败了早期的经典计算机。”而研究员在 2016 年底已可以操纵 10 个纠缠光子,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他们计划今年年底实现操纵大约 20 个量子比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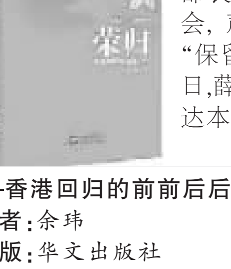
(摘自《新纪实》)

香港本可提前五十多年收回

1941 年 12 月 7 日清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12 月 8 日香港时间早上 8 时,日军进攻香港。到 12 月 25 日,日军占领了英国统治了 100 年的香港,米字旗换成太阳旗。自此,香港进入“3 年零 8 个月”的日治时期。

倾斜的谈判桌

1942 年 1 月 1 日,中、美、英、苏等 26 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对轴心国共同行动的宣言,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次日,蒋介石接受同盟国的推举,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本战区的盟军共同对敌作战。中、英、美成为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盟国,为中国收回香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荣归——香港回归的前前后后》
作者:余玮
出版:华文出版社

1941 年 6 月 11 日,迫于当时的形势,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战后将放弃在华特权。1942 年,蒋介石向英国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要求,这一姿态在国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同情。

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英国在战后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愈加强硬。不管此时英国政府内部有多少不同意见,没有一种意见是主张在战争期间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时就考虑香港问题的。中英新约的谈判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

新约谈判的失败

新约谈判提上日程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中国政府提出中英新约草案。国民政府外交部经研究对草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1899 年 6 月 9 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在这里只提出了 1899 年条约和九龙租借地问题,没有提及 1860 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和英国根据这一条约占据的九龙半岛,更没有提及 1842 年的《南京条约》和香港本岛,应该说国民政府考虑到问题的难度,因此提出了比较克制的要求。

但最后,英国外交部的方针是:坚决抵制中国的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

在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态度最坚决的似乎是蒋介石。他坚持新约中要包括这一问题,否则,他宁愿不签订条约。谈判眼看面临僵局。驻英大使顾维钧建议应当先签新约,同时公开讲明,希望英国战后归还九龙租借地。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

1943 年 1 月 11 日,中英新约与中美新约同时签订。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向薛穆提出一项照会,声明: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21 日,薛穆复照称,业已将此通知转达本国政府。英国没有通过这次换文承担任何义务,作出任何承诺。中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谈判完全失败了。

蒋介石为何放弃收回香港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表示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显然是估计到了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会有麻烦,特地于 8 月 14 日下午召见薛穆,声明“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只是希望最终能解决香港问题。这实际上是给英国吃定心丸,表示中国近期内不会提起香港问题。

蒋介石之所以对英屈服,除了反共优先的主要因素外,美国态度转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战后美国在与苏联的抗衡中需要英国的支持,在战后的欧洲事务中也需要英国的配合,因而它不愿意因香港问题而影响美英关系。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15 日,杜鲁门总统向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达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内称:“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8 月 18 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总命令解释为意味着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

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把香港问题放在应有位置,见美国随声附和,他被迫作出让步,表示“同意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去接受香港日军投降”。9 月 1 日,米字旗又出现在香港的上空。

我的韩国朋友看中国

我的外国朋友中,韩国青年最多。和漫长拖沓的韩剧不同,生活中的他们,敏锐而直接,冷不丁地,就能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个中国人熟视无睹的中国。

去英国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位在北京上大学的韩国“资二代”。不过,有意思的正是这位韩国“资二代”,对她的那些同样富裕优越的中国小伙伴们的观察。

一方面,她显然非常喜欢她们。但另一方面,她对这些中国同龄人的描述,又不可谓不犀利。“我的中国朋友,总是问他们的父母要这要那,父母不给就不高兴。他们可以不上课,坐飞机来英国看望自己的女朋友。”“他们总是问我,你的父母有几辆车,赚多少钱?可是,和他们做朋友的是我,不是我的父母啊。”“中国朋友们在一起,不讨论什么有意思的话题,除了买东西。”

另一位韩国青年,和我相熟多年。他的中文很好,对中国历史尤感兴趣。“你们啊,是大国小器。”他如是总结。放眼望去,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却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在重新变为大国的过程中,中国人付出了格局越来越小的代价。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中国老百姓也会觉得,偏狭之人正越来越多。但常常因为习惯性地将自己排除在外,而不被当作对中国人的整体评价。于是,每一个中国人偷偷藏在心底,不愿意面对的话,最终被一个韩国青年,喝着青岛啤酒,说了出来。

还有一位,是完全不懂中文的女孩子,嫁了个外籍老公,生活在南半球。我们见面时,是北半球的冬季,首尔的人们正在寒风中静坐游行,要求朴槿惠下台。

我问她,“你觉得这次有希望吗?我所认识的韩国朋友,每次都会说,这回是老百姓选错了人。但下一次选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她认真地想了想,看着我说,“有希望,只要去做,就一定有希望。”

“难道不觉得韩国的政局周而复始吗?”“因为过去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斗争是有用的。”她那充满自信的语气和神色,让我一直记得:原来,一个社会中,人们长久的信心,并不来源于知识或情感,而只可能从自身历史和社会经验中顽强地生长出来。

最后一位,是在我的班上选课的韩国学生。我的这门课,是一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通识课。期末作业需要回答这样一道题:重读鲁迅的“热风三十六”,如果有机会和有着“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的鲁迅展开交流,你会说些什么?

中国学生要么认为中国已经强大,我们不再需要什么大恐惧,要么提出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认为大恐惧仍然存在。

在诸多回答中,最让我意外的,倒是一位韩国学生的回答。他的中文并不算好,写得磕磕绊绊,意思却很清楚。那就是,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发展速度当今无人能及;但另一方面,仍毫不留情地写道:“你们仍然应该需要感到大恐惧,因为中国的当代文化没有民族性。”

至今我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样的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只是觉得,在“大恐惧”的意义上,比那些企图用经济、用技术、用文化来安慰和分担鲁迅先生的忧心的中国学生来说,他的理解更加平实,不虚妄。

(摘自《南风窗》 罗小茗/文)